

# 清初耶稣会士巴多明中西 文化科技交流活动述评\*

王银泉

[南京农业大学, 南京 210095]

关键词: 巴多明; 耶稣会士; 中西文化科技交流; 科学思想; 学术贡献

摘要: 清初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 以其渊博的学识促进了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 对于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以及西方世界对中华文明的认识与了解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 长期以来, 巴多明在中西文化科技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却未得到应有的认识和重视。本文通过对耶稣会士中国书简等史料的考察, 对巴多明在中西文化科技交流方面做出的诸多贡献进行了相关研究。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511(2010)05-0088-07

明朝晚期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 奉耶稣会中国传教会之命, 于1613年返回欧洲招募新的教士, 并于1619年带着20余名新传教士抵达澳门再入中国内地。此次招募行动带来了有着很深学术造诣并且日后在中国大力传播、译介西学的传教士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傅汎际等人。1693年6月, 曾以“国王数学家”的名义于1687年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白晋, 奉康熙帝之命返回欧洲招募新传教士来华服务, 而这批于1698年11月4日从广州入境的新传教士中的马若瑟、雷孝思和巴多明等人, 也在中西文化科技交流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 在学术界对明清之际近二百年的耶稣会士来华历史的研究中, 与巴多明同船来华的马若瑟和雷孝思这两位法国耶

稣会士早已成为中外学者的研究重点, 而巴多明这位耶稣会士却长期受到冷落。比如,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编撰的数字版汉学家资源库中, 与白晋同批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以及后来由白晋赴欧洲招募来的新传教士中, 只有白晋、马若瑟和傅圣泽入选, 巴多明则榜上无名。但是, 客观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 巴多明对于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以及西方世界对中华文明的认识与了解, 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同时他也依托其大量的翻译实践形成了我国早期的翻译观。在某些方面, 比如对于中国统治阶层的影响力, 巴多明的作用更是连利玛窦等人都望尘莫及。

## 一、巴多明其人

收稿日期: 2009-10-12

作者简介: 王银泉, 男,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南京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中国传统中医文化海外传播及其影响研究”(项目编号: 10BZX02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巴多明 (Damién Parrenin, 1665 ~ 1741), 字克安, 1685年9月1日入法国耶稣会, 1698年11月来华传教, 1741年卒于北京。在中西文化科技交流史上, 巴多明绝对是一位不应该被忽视和遭冷落的重要人物。在曾为中国传教事业作出过卓越贡献的众多传教士中, 巴多明是以其学贯中西的渊博学识以及为中西文化和科技交流所做出的贡献而名留史册的。有记载说: “康熙皇帝从一见到他起, 便很快就觉察到了新来的这位传教士的才能与美德。从此之后, 皇帝便喜欢、尊重并另眼相看他了。”<sup>[1](P239)</sup>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也有如下描述:

康熙帝善知人, 见其体貌魁伟, 器而重之, 为之选良师授以满、汉文字。不久多明遂谙华言, 以前欧人之操华语者无人能及; 其满语流利, 与其操母国语言无异。帝喜与之言, 辄作长谈, 帝前从张诚、白晋二神甫所习之几何、植物、解剖、医科等学, 至是逐日渐精通。多明并以世界各国之政治风俗、欧洲各朝之利害关系告帝; 帝之得以重视路易十四世之为人, 皆多明进讲之力也。<sup>[2](P510)</sup>

由帝之宠眷, 与其谓为荣耀, 勿宁谓为疲劳, 盖帝不以进讲为足, 有时命多明将最奇异而最感兴趣之点详细译写进呈。如是多明将科学研究院及其他作者著述中, 关于几何、天文、解剖等科最新奇之说译为满文。此外多明为应皇帝、诸王公大臣、中国学者等之询问, 笔录甚多, 各种学科几尽涉及。<sup>[2](P511)</sup>

## 二、渊博的科学知识

巴多明在来华之前就掌握了丰富的科学知识, 其在多个学科领域的渊博学识不但在国内时就为人所叹服, 而且更为其抵达中国之后在中西文化科技交流活动中成就一番事业提供了保障。费赖之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写道: “昂布鲁大主教布鲁拉尔 (Brulard) 与驻军将领咸重其为人, 知其具有作大事业之天才, 盖在

谈话中对于其物理学、文学、史学、地理、几何、国内名阀世系、甚至军事学等类知识皆甚倾服也。”<sup>[2](P509-510)</sup> 巴多明的这种博学多才同样深深地吸引着康熙皇帝, 以至于他只要一有空就会把巴多明召进皇宫进行家庭谈话式的交谈, 向他请教各种科学知识以及欧洲的风土人情, “康熙皇帝正是在与巴多明神父的这种家庭式友好谈话期间, 使过去由张诚和白晋神父向他传授的有关几何学、植物学、解剖学、医学、外科学等诸多知识, 得以进一步精进。康熙也正是从巴多明那里获悉了欧洲宫廷中的不同关心焦点、距中国遥远的国家和民族的古代与近代历史, 此外还有世界上不同国家的风俗、习惯和政府。”<sup>[1](P242)</sup>

随着巴多明卓越才华的不断施展和发挥, 康熙对他也越来越着迷, 以至于他不再仅仅满足于与巴多明的交谈, 而是要求他像白晋和张诚一样列出一份书函授课大纲, 同时还要求巴多明选择将西方科学著作中最有意义和最好奇的地方翻译出来。于是, 为了满足皇帝的好奇心和强烈的科学兴趣, 巴多明神父将法国皇家科学院提供的科学著作中有关几何学、天文学、解剖学中最新、最引人入胜的内容译成鞞鞞语, 大量的西学译介著述便由此而来, 其中代表性的译著就是《人体解剖学》。巴多明在写给法国科学院院士的信中说: “我在所知的以拉丁文、法文或意大利文写作的解剖学家中选择了迪奥尼斯 (Dionis) 先生的著作, 我觉得它最清楚、最准确。我根据他的顺序和方法做了解释。至于插图, 我则喜欢巴托兰 (Bartolin) 先生的作品, 因为它们比其他的更大、刻印得也更好。谈到人体内部血液循环时, 我尽量模仿作者的清晰和明确, 但我的表达比他稍显罗唆, 因为皇帝缺少必要的知识, 难以轻而易举地明白我要向他讲述的内容。”<sup>[3](P298)</sup> 根据关雪玲的研究, 巴多明翻译人体解剖学的工作流程如下: 执笔者先将巴多明口授的内容速记下来, 除了力求内容真实准确外,

其余的都暂且不顾。待全部记录完毕后,再由执笔者进行文字加工,撰写成译作。直到执笔者满意后,再交由巴多明审看。若发现因使用华美词藻而曲解内容的现象,巴多明会毫不留情,让其推翻重来。之后进行校对,校对人员审查遣词用句是否规范,条理是否清晰,语言是否简练。所有这些程序完成之后,把译稿誊清呈给皇帝御览。必要时康熙会亲自修改措词,润色文字,但对专业理论知识则不做更动。他从始至终对文字把关,直到年后这部译著杀青。康熙亲自定书名为《钦定格体全录》。<sup>[4](P110)</sup>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康熙“考虑到文教问题,恐怕书中的解剖图对年轻人有不良影响”,故该书的满文译著最终被康熙收藏起来为己所用,当时分抄三部,一部藏北京文渊阁,一部藏畅春园,一部藏于避暑山庄。因此,该译著不但未对中国医学产生影响,甚至未能流传至今,从而使中国学者失去了了解、接触西方最新医学成就的机会。巴多明后来把手稿寄往法国科学院,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 三、语言学比较研究与多语种翻译实践

巴多明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自然科学家,而且还是一位卓越的语言学家,他首先“征服”康熙的就是其出色的语言天赋。来华之前,巴多明就已经精通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由于耶稣会开创的适应性传教路线的影响,以及前期抵达中国的传教士在适应性传教策略的指引下为传教工作打开了局面,扩大了教会的影响,实现了传教的目的,所以巴多明抵达中国后也立即投入到了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的行动中,凭借其语言文字方面的天赋,他不但很快就掌握了汉语,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出于与清朝统治阶级建立密切关系的需要,他还把满文(时称鞑靼语)学习和掌握到了娴熟的地步。“皇帝替他请到了老师,教他学习汉语和鞑靼—满族语。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把汉语讲到任何欧洲人都

从未达到过的水平,他也可以如同使用其母语一样纯正而流利地讲鞑靼语”,不久之后,“人们非常惊奇地发现他的鞑靼语、汉语、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讲得同样都很流畅。”“巴多明神父的这种双语表达能力的天赋,吸引着康熙皇帝经常与他长时间交谈。”<sup>[1](P242)</sup>

巴多明对中西语言文字的比较和解读,堪称中外语言学对比研究的早期典范。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至今仍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在其1723年5月1日于北京写给法国科学院诸位先生的信中,巴多明十分详细地陈述了他与皇帝长子之间就欧洲文字和汉语、满语、蒙古语、朝鲜语和藏语之间的相似点与不同点以及彼此的优劣问题所进行的畅谈,间或伴随着激烈的争论。两人通过举例说明,就各种语言,尤其是汉语与满语,中文字与欧洲文字之间在字母、语音和语法等方面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博学多才的巴多明凭借自己通晓多国语言文字的天赋,通过反复举例、试验和详细分析,毫不客气地向皇子指出了相对于汉语和欧洲语言,满语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他对皇子说:“在您的母语与汉语之间,您更喜欢前者,然而,懂得这两种语言的汉人,他们却不同意这一点,何况事实上也无法否认鞑靼语中存在着缺陷。”巴多明随后又对欧洲文字和鞑靼语进行了比较,他向皇子指出,虽然鞑靼字母中有不少地方与欧洲文字的字母相似,但仍有许多的缺陷,比如,与法语相比,鞑靼语的特点之一是,若使用faire(做)这个动词,几乎每次都要因后面所跟的名词的变化而变化;相邻的两行文字中若出现同一个词,他们也不能忍受,因为这会使文字变得单调乏味,听起来不舒服。在这些例证分析的基础上,巴多明向好学的皇子解释了有生命的语言和无生命的语言之间的差别。此外,两人的交谈或者争论还涉及到不同语言在接触过程中相互渗透、相互吸收的现象,亦即外来语

问题。

巴多明与皇子间有关语言学的对话虽然属于较浅层次的切磋，远远没有上升到学术讨论的高度，但是，这样的切磋完全可以被视为我国较早的中外语言学对比研究。虽然其影响力尚难有定论，但就法国传教士来华的背景来说，巴多明充分展示了出色的语言学能力，并把在中国所进行的体验与实践最终通过其向法国科学院和教会的书信传递到了欧洲，加深了欧洲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从而促进了汉学的发展，从这一角度来说，其价值是自不待言的。

#### 四、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翻译培训学校

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在积极投身于大量翻译活动的同时，还在中国创办了一些翻译培训学校，而第一所这样的学校即是由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和宋君荣（Antoine Gaubil 1689~1759）一手打造而成的西洋学馆，设立的目的是专门为清廷培养外交翻译人才。《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690~691页记载道：“北京有翻译馆，教授旗籍子弟以拉丁语文，俾能在中俄交涉中任译事。主馆事者为巴多明神父，多明卒，君荣继掌馆事，兼为拉丁语、满语翻译。”关于巴多明奉命创办这所翻译培训学校，迄今为止的研究大多还是引用来华耶稣会士的书简集中的相关内容来予以佐证。但是，郭福祥在清内务府奏销档案中发现的两件有关巴多明与清宫西洋学馆的汉文档案，很好地弥补了史料的不足。<sup>[5] (P23)</sup>这两份档案之一为乾隆元年四月十二日之总管内务府口奏绿豆牌白本档案，另一为乾隆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和硕庄亲王之奏摺。这两份档案就巴多明奉命创办西洋学馆所反映出的事实如下：

第一，清宫西洋学馆于雍正七年（1729年）始设，至乾隆八年（1743年）十二月停办，历时15年。它是雍正帝为了加强与外国的交流，培养翻译人才而专门设立的，具体的运作由内务府负责。第二，学馆所授外语只有拉丁语一门，学习周期不定，一般为5至7年。第三，关于学生来源，本着自愿原则，由内务府有关部门从内务官员子弟中选取，学习期间的待遇与咸安宫官学生相同。<sup>①</sup>第四，学馆共招收学生三批，共计40名：雍正七年第一批20名，其中的7人因资质较差而被斥革，13人学成；第二批10名，3名被斥革，7人学成；第三批10名，学习期未满便被分至各处行走，结果未知。由此可见，于西洋学馆最终完成学业之学生总共只有20名，故和硕庄亲王之奏摺中有“自开馆以来学习西洋字话俱能书写，年满辅以笔贴式等缺行走者二十人”等语。第五，学馆早期由巴多明负责教学工作，宋君荣也参与其事，乾隆六年（1741年）九月二十九日巴多明在北京去世，此后宋君荣继续主持馆事，直到学馆被裁汰。第六，完成学业之20名学生大部分被任命为内务府笔贴式<sup>②</sup>等职，但并未参与具体外交事务。依据上述史料可以看出，雍正帝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在1729年不但成立了咸安宫官学这个全国首屈一指的人才培养机构，同时还颇有创造性地指派巴多明等耶稣会士开办翻译培训学校，专门为清廷培养外交翻译人才。

#### 五、影响朝廷的科学思想

1687年之后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在西学译介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利用其受到朝廷青睐和敬重的机缘，对整个朝廷的科学技术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些

① 咸安宫官学，清雍正七年（1729年）为教育清内务府三旗子弟及景山官学中之优秀者而开设，因办学地点在紫禁城内的咸安宫而得名。

② 清官名，掌翻译满、汉章奏文字等事，置于京师各部、院，盛京五部，外省将军、都统、副都统官署。以满族、蒙古族、汉军旗人充任，宗人府则专用宗室。有翻译笔帖式、缮本笔帖式、贴写笔帖式等名目，为满员进身之阶。

影响对于促进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在中国的传播,提高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价值。以巴多明为例,他利用康熙皇帝对自己的器重,同时也是出于康熙皇帝的要求,译介了大量西方科技著作,而且大多译为满文,有些甚至又从满文翻译成了汉语。对于其中的情形,巴多明在给法国科学院诸位先生的信中有过详尽的叙述:

你们或许会感到惊讶,我为何从如此遥远的地方给你们寄以你们无疑不认识的文字撰写的|部解剖学论著、|部医学大全及|些物理学论著呢?但是,当你们看到我所寄的是译成了鞑靼文的你们自己的著作时,你们就不会惊讶了。……

在欧洲也非常有名的中国皇帝热爱科学,渴望获得外国的知识,但他不认为必须学习我们的语言以利用这些知识;他觉得对他来说最便捷的办法是让我把(法国的)种种发现详尽地译成他的母语,因为以前我在交谈中只对他做了粗略的介绍。……因此,他命我把|部解剖学著作和|部医学大全译成鞑靼语。……皇帝之所以确信我能胜任他委派的任务,是因为约十年以来,我奉旨把大量鞑靼文字译成了欧洲文字,此外,我还把法文、拉丁文、葡萄牙文和意大利文译成了鞑靼文。<sup>[3](P286-289)]</sup>

从上述文字中不难看出,巴多明并非没有在西学译介活动中撰写著述,只是一来其译著用的是满文,二来其译著主要是为了满足皇帝的好奇心和兴趣,以至于有不少西方科技译介作品甚至都没有被刊印,所以才会导致其西学译介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至今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实际上,由于巴多明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西学译介工作之中,也由于其深得康熙的信任和敬重,因此,巴多明的西学译介活动及其成果不但丰富了康熙的科技知识,更是对康熙的科学技术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与此同时,由于其长年累月地活动在上层社会,因此

其西学译介活动及成果也对上层社会尤其是热爱西方科技知识的官宦士大夫们学习和发扬西方科学技术、会通中西科技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这些方面来说,巴多明等法国传教士为康熙年间我国诞生的许多重大科技成果起到了催化剂和加速器的作用,这也是1687年后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对明清之际二百多年的中西科技交流史做出的贡献所在。

自明末耶稣会士来华并以科学传播为手段进行传教活动之后,当时中国的一些能人俊杰就在会通中西科学技术及其思想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并且创造了很多的成果,如明末时期被称为“中国天主教三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以及王徵、密之、熊明遇、方以智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又如明末科学家方以智,通过会通中西科学技术,深知西方科技在总体上超过本国,故而务必引进西学,促进科学技术发展。他主张以传教士为师,学习他们的科学技术,但不盲从,而是舍弃其错误,吸取其精华,使之与中国传统科技相结合,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以利国计民生,其代表作《物理小识》一书中就大量吸取了西方科学技术的成果,介绍了西方的天文历算、地理气象、人体生物、医药等方面的学理和知识。

巴多明等法国传教士对中国科学技术及其思想的影响,还尤为突出地体现在康熙身上。虽然传教士在中国传播西方科技知识自利玛窦起就已经开始并且从那以后对中国科学技术进步的影响颇多,但是,由于巴多明有身随康熙的独特优势,清朝时期在康熙的亲自过问和主持下所诞生的一些重大科技成就,就与巴多明等法国传教士对他灌输的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和思想密切相关。季羨林先生曾说:“到了清代康熙皇帝统治时期,这一位大皇帝并不一定为天主教义所动,然而他的目光犀利,看到了西方科技的重大意义,亲自学习西方的几何学。皇帝的榜样有力量,清代颇出

了几个大数学家。<sup>[6] (P1-2)</sup>康熙早在幼年时期就请传教士为师,向他们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著名传教士南怀仁就经常被召到宫里,为其讲授西方科学知识。这位称孤道寡的皇帝对西学了解的程度令人瞩目:从天文、地理到物理、化学,甚至高等数学、西洋音乐,他全都学过,而且学得还不错。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西学知识对他的治国方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根据袁运开、周瀚光的研究,康熙认为,研究西方科学技术,首先要引进西方的科学著作、科学仪器和科学人才,但由于语言文字的隔膜,要想研究西方技术,离开西方人士就将寸步难行,而在华之西洋人士中,惟传教士多为学者,其中相当一部分还通晓数学、自然科学,他们以此为传播天主教之诱饵。所以,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惟有通过传教士,舍此别无他途。为此,康熙在来华的传教士中,悉心笼络其中的科学家,使其为己所用。同时,他也赞成中学西源,主张对中西科技进行比较、会通。<sup>[7] (P307)</sup>黎维秋也指出,早在康熙帝初习西学时,他就十分重视翻译与编撰西学书籍,在他的倡导和鼓励下,整个康熙时期基本上保持了明末徐光启时代西学东渐高涨的势头,传教士与中国学者一起译述了不少西方科技书籍。<sup>[8] (P255)</sup>

## 六、探讨中国科技落后原因的西方第一人

巴多明对中西文化科技交流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还在于他向欧洲介绍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由于其来华的另一目的是考察中国的科学技术以便让法国借鉴利用,因此,1687年后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比过去的传教士更加重视向法国科学院和本修会写信汇报其在中国的情况,这些书信把有关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的许多事实传递到了欧洲,客观上拉近了中西之间

的距离,加深了欧洲对中国的认识与了解,为中学西渐做出了贡献。

在这些奉命发回国内的对中国国情和科学进行考察的书面报告中,巴多明也倾注了很大的精力,其书信占据了整个耶稣会士书简的相当篇幅。据《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一书统计,其写给本国耶稣会的信有11封,写给法国科学院的有5封。在巴多明的这些书信中,最为重要的是他与法国科学院院士之间的通信往来,尤其是他与先后担任法国科学院院士、常务秘书和院长的德·梅朗(de Mairan)之间的通信往来,让我们在今天得以了解当时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对中国科学的看法。根据韩琦的研究,<sup>①</sup>自1723年开始,巴多明就和皇家科学院接触,并寄去了两封信。1726年,科学院收到了巴多明寄去的一些礼物。作为答谢,科学院委托德·梅朗和他通讯,并询问了许多有关中国科学的问题。1728~1740年,德·梅朗向巴多明寄出了一系列有关询问与了解中国历史文明、天文学的信件,1759年他把这些通信整理发表,名为《德·梅朗先生给在北京的耶稣会士巴多明神父的书信:包括有关中国的不同问题》(Lettres de M. de Mairan au R. P. Parrenin, Missionnaire de la Compagnie de Jesus, Pekin contenant diverses questions sur la Chine Paris 1759)。双方在十余年的通信往来中重点探讨了中国科学,尤其是在承认中国科学长期以来具有的很多世界领先优势的情况下,探讨其发展停滞不前的原因。在此期间,巴多明力求从公正客观的角度出发,针对德·梅朗对中国科学技术所表现出来的偏见乃至其从欧洲中心论的片面优越性出发试图全盘否定中国科学的观念进行了解释和纠正。如巴多明在1730年8月11日写给德·梅朗的信中,针对德·梅朗在回复巴多明的上一封信件

<sup>①</sup> 韩琦:“17、18世纪法国科学家眼中的中国科学”,该文为2004年8月22~24日于清华大学召开的“多元视野中的中国历史——第二届中国史学国际会议”论文。

中质疑中国人的“天文观察的可靠性、其古代历史的真实性、其艺术和科学的尽善尽美性”等等偏见甚至是蔑视性的言论,对其作出了耐心细致的解释。德·梅朗在回信中从欧洲中心论出发得出了如下结论:“中国的科学和艺术似乎不应该起源于如此古老的时代,或者中国人是所有民族中在艺术和科学方面最为天生不幸的人,他们既无力于改进已有的科学技术,又不善于对它们进行创新。他们从上古时代起就有了火药,却不懂得设计出火炮来;他们具有拓印技术,却没有掌握在我们这里很快就出现的印刷术。”<sup>[8](P39)</sup>为此,巴多明在复信中详细地回答了德·梅朗所代表的西方国家对天文学的质疑,说明了中国天文学的局限,并介绍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古老传统以及中国人对医学的看法。在探讨中国科学为何落后和停滞不前的原因时,巴多明认为,首先是政府对学有专长的人才不够重视,其次就是缺少竞争机制,再者就是没有促使科学发展的远见卓识。他还就政府在促进科学技术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提出了在当今提倡科技创新的时代仍不失其远见卓识的看法:“促使这些科学在中

国繁荣昌盛的办法,就是不只是要有一位皇帝,而是要有数位连续执政的皇帝,支持那些以其研究和实用而成功地得出新发现的人;他们积累巨额奖金,以赏赐功勋卓著的人员,为其提供必要的旅行和购置仪器的经费;他们必须使数术学家们从贫困的恐惧中解脱出来,或者是从看到被不大精通这类知识者的迫害中解脱出来……。”<sup>[8](P41-42)</sup>

巴多明由此成为西方世界客观公正地详细探讨中国科技落后原因的第一人。从20世纪前期开始,李约瑟博士对古代中国科技为什么会停滞不前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探索,并且撰成鸿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奠定了其学术地位。殊不知,早在18世纪,巴多明已经就这一问题进行过客观公正和积极有效的探索了。根据曹增友的考察,伏尔泰对巴多明的研究及其提供的资料评价甚高,在其《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中,伏尔泰写道:“巴多明是知识的伟人,他在欧洲知识界的知名是源自他对欧洲最博学哲学家对中国科学向他提出的最困难问题的充满智慧和启迪性的回答。”<sup>[9](P89)</sup>

#### 参考文献:

- [1] 沙如玉神父致韦基塞尔神父的信 [A]. [法] 杜赫德.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 卷 IV [C]. 郑德弟, 等译.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5.
- [2] [法] 费赖之.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 [M]. 冯承钧译.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 [3] 巴多明神父致法兰西科学院诸位先生的信 [A]. [法] 杜赫德.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 卷 II [C]. 郑德弟, 等译.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5.
- [4] 关雪玲. 康熙朝宫廷中的西洋医事活动 [J].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04 (1).
- [5] 郭福祥. 巴多明与清宫西洋学馆 [J]. 紫禁城, 1997 (4).
- [6] 季羨林. 总序 [A]. 汪晓勤. 中西科学交流的功臣——伟烈亚力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 [7] 袁运开, 周瀚光. 中国科学思想史 [M]. 合肥: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1.
- [8] 黎难秋. 中国科学翻译史 [M]. 合肥: 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6.
- [9] 曹增友. 耶稣会士巴多明及其中国科学、历史观念 [J]. 北京社会科学, 1995, (4).
- [10] 巴多明神父致法国科学院院长德·梅朗先生的信 [A]. [法] 杜赫德.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 卷 IV [C]. 郑德弟, 等译.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5.

■责任编辑 顾 桃

cism through his notice of idealism's emphasis on relationship and wholeness.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experience by the reformists of British empiricism helps him see through the common defects of empiricism and idealism. William James holds that British empiricism is empiricism and its understanding of experience is not complete. William James' criticism of British empiricism offer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empiricism and helps establish a new philosophy, that is, radical empiricism.

## The Development Choice of the Supply System of Public Goods in Rural Areas in the Context of Constructing a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YUAN Wen-quan, SHAO Hai

The supply level of public goods in rural areas (PGRA) and the difficulty degree of farmers' access to public goods will determine to a large extent the level of living standards of farmers and affect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constructing a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in China. In this process, we must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upply of PGRA. From the period of the People's Commune to the abolition of agricultural taxes, there were only a few changes in the forms of PGRA supply but no essential changes. In the new period, the supply mechanism has become more reasonable but some problems still remain. Thus, it is only through the improvement or innovation of the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the supply system and its legal reform that PGRA supply system in China can meet the needs of constructing a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and realizing its goal.

## A Comparison of the Changes in the Life Values of the Youths in Russia and China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SHEN Hui, LIAN Lian

The life values of the youths reflect their judgments and choices in life in a particular historical period. Through a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the changes in the life values of the youths in Russia and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life values in the context of different reforms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and reveal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reform process,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life values of the youths, which provides a specia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the reform process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Russia and China.

## The Female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in the Early Modern Times in the Literary Texts: A Study of *The Exile*, *Fighting Angel*, *Photos* and *The River Garden of Pure Repose*

LU Li-xia

The literary texts can help reveal the female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in the early modern times, a special group in a special historical time. With a focus on *The Exile* and *Fighting Angel*, two biographical masterpieces by Pearl Buck, and *The River Garden of Pure Repose* by Grace M. Boynton, as well as *Photos* by the famous Chinese woman writer Bing Xin, the paper first discusses the surface meanings of several typical dialogues in them and then gives an incisive analysis of the underlying social and religious implications in order to expound their activities and thoughts.

## The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S<sub>1</sub>? S<sub>2</sub>Neg?" Used in the Lat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YE Jian-jun

"S<sub>1</sub>? S<sub>2</sub>Neg?" in Chinese emerged in the lat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This special interrogative group had a negative word at the end of the sentence which was not grammaticalized into a modal. The emergence of this interrogative group derived from pragmatic reinforcement and its generation mechanism was a blend of the alternative interrogative group and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questions. This phenomenon of blend existed not only at the level of single sentence but also at the level of complex sentence or even sentence group. This understanding could better explain "S<sub>1</sub>? S<sub>2</sub>Neg?" as a special interrogative group.

## A Restudy of the Linguistic Features of Chinese Obscure Poetry

WANG Wei

Linguistic problems have always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in the research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However, most of the traditional researches in this field regard language as a factor of form and have a limited understanding of its position and role. Chinese Obscure Poetry merged in the 1980s and quickly became popular. This kind of poetry is sharp in poetic language and elastic and powerful in thinking and expression. With its bold spirit of criticism and innovation and uniqueness of linguistic feature, Chinese Obscure Poetry ushered in a fresh wind for Chinese poetry as well as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new period. The paper focuses on two linguistic features of Chinese Obscure Poetry.

## A Study of Jesuit Missionary Dominique Parrenin and His Contributions to Sino-West Cultural and Scientific Exchanges in the Early 18<sup>th</sup> Century

WANG Yin-quan

The French Jesuit missionary Dominique Parrenin, who was sent to China during the early Qing Dynasty,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spread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He also played a vital role in promoting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as well as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the West. Little attention, however, has been paid to his position and role in this aspect. The article expounds Parrenin's various contributions to the Sino-West cultural and scientific exchanges by examining the Jesuit missionary letters from China and other firsthand historical documents.